

《四溟瑣紀》的實學視闖及其知識建構*

潘殷琪**

摘要

《四溟瑣紀》於光緒元年三月八日起正式在上海發行，雖為《瀛寰瑣紀》續刊，然由版式及內容卻可看出逐漸回歸中國傳統文人品味，倡導濟世安民、格物致知之作，也更偏向刊載記述中國固有技藝手法的文章，充分展現新編者群的實學觀點及選文標準。究其緣由，與報刊創立的時代氛圍、目標客群的審美偏好和編輯群體的社會實踐皆有所關聯。

本文透過深入剖析陳裴之《澄懷堂文鈔卷·答查伯葵問西北水利書》、節錄自徐光啓《除蝗第三·屯田疏稿》的〈治蝗說〉，以及章鳴鶴著、范棫士點校的《谷水舊聞》等三種講述實學之作，依序闡述這些洋場才子如何將陳氏父子的經世功績與文壇影響、徐光啓的務實觀點、松江官紳有益民生的作為有系統地連載刊出，進而形構以上海為核心的傳統實學網絡。同時亦透過反覆辯證，曲折譜寫出在當代原助益於西北史地學的研究方法，是以何種形式被轉化為有裨於世的實用手法，並實際運用在報刊的傳播過程之中。

最終，將目光聚焦於這群齊聚洋場的文化精英，思考他們於此特殊時期刊行這類作品的動機及意涵，是否囊括面對時代災害的隱憂和關懷？抑或是具有以文學進行文化療癒，從而激勵讀者生發勇氣的構想？以此剖析新式傳播媒介促使晚清文人開創的諸多機會與可能。

關鍵詞：《四溟瑣紀》、近代報刊、實學、上海、編輯策略

* 本論文完成於國立中央大學 111-2 學期呂文翠教授開設之「近代報刊與文學」課堂，議題發想乃至於撰寫期間皆承蒙呂教授及同儕們悉心指正；修改過程中亦承蒙多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筆者受益匪淺，特此致謝。

**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生。

一、前言

《申報》館自光緒元年三月八日（1875年4月13日）起，於上海正式發行《四溟瑣紀》，可視為中國近代最早的文學期刊——《瀛寰瑣紀》¹的續刊。主筆由蔣其章（字芷湘，1842-1892）更換為錢徵（字昕伯，1832-?）和蔡爾康（字紫黻，1852-1921?），雖欄目無甚差別，皆包括政論、時事、民俗、史傳等題材，²保留議論性兼文藝性的特點，然卻更改為袖珍版式，³選文內容也逐漸回歸中國傳統文人品味，世界新聞及西方知識大幅度減少，⁴與《瀛寰瑣紀》「仿《中西聞見錄》而更擴充之」⁵的體例相距甚遠。⁶

如此轉變除了涉及主筆更替，最初創設《瀛寰瑣紀》的緣由也是要因之一。

《申報》自創刊起便確立追求「雅俗共賞」的定位⁷以及明確的華人市場意識，此舉雖成功在江南一帶稍開民間閱報風氣，但卻未被士大夫階層廣泛接受。⁸於是數月後，深諳江南文化傳統及審美意趣的主筆們，遂以文學期刊的形式另闢蹊徑，將「議分鄉校，願考見夫濟世之經猷；源討楹書，願採輯夫證今之學問」⁹設為目標願景和選文方法，望《瀛寰瑣紀》能彌足《申報》之缺失，同時更加確立面向

¹ 《瀛寰瑣紀》自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一日（1872年11月11日）於上海正式發刊，主編為《申報》館主筆蔣芷湘，共刊出二十八卷，直至光緒元年二月九日（1875年3月16日）正式停刊，而第二十八卷封面之所以署「甲戌十二月」，是因月刊行期之故。

² 阿英曾言《瀛寰瑣紀》「雖是文學期刊物，內容的範圍卻相當雜」，並根據篇目說明「從我們最早的文學刊物裡，就有政論的部分。也包括不少史傳材料。有關民俗的詩文多，也是這一刊物的特點」。而作為續刊的《四溟瑣紀》在內容上也延續此特點，不過在選文上卻有所轉化。見於阿英《晚清藝文報述略》，（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1958年3月），頁7-10。

³ 此袖珍本係遵照武英殿聚珍版之制，大有符合士大夫閱讀習性之意圖。「本館所刻《瀛寰瑣紀》，逐月出書，已至二十八卷，板式稍大，頁數較少。今自本年正月分起改為袖珍板式，增添頁數，庶舟車携覽，更形簡便，改名《四溟瑣紀》。」見於《申報》1875年4月10日第904號，光緒元年三月初五，頁1。

⁴ 「《瀛寰瑣紀》在第二十八卷後更名為《四溟瑣紀》，內容已經停止《昕夕閒談》的連載，亦不復再有重點式介紹西方文化的文章，整部期刊已轉向傳統文人的趣味」。見於呂文翠：〈巴黎魅影的海上顯相——晚清「域外」小說與地方想像〉，《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一八四九——一九〇八》，（臺北：麥田出版，2009年11月），頁40。

⁵ 〔清〕〈瀛寰瑣紀序〉，《瀛寰瑣紀》第一卷，（上海：申報館，同治十一年十月），頁2。

⁶ 編輯方針並非一朝一夕的轉換，其實自《瀛寰瑣紀》第十七卷便可看出蛛絲馬跡，即此卷「內容已全為詩文小說書札，而不見非文藝方面的東西了。」見於周振鶴：〈《瀛寰瑣紀》介紹〉，《書城》，1997年02期，頁38-39。

⁷ 「求其記述當今時事，文則質而不俚，事則簡而能詳，上而士大夫，下及農工商賈，皆能通曉者，則莫如新聞紙之善矣。」見於〈本館告白〉，《申報》1872年4月30日第1號，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⁸ 此論點見於何宏玲：〈《瀛寰瑣紀》與近代文學風氣的轉變〉，《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2年3月第1期，127-132。此外，《申報·本館告白》亦曾云：「筆墨自愧其荒蕪，不足以供大雅；篇幅尚嫌其短狹，不足以助清談」。見於《申報》1872年9月9日，同治十一年八月七日。

⁹ 〈刊行《瀛寰瑣紀》自敘〉，《申報》1872年10月11日，同治十一年九月十日。

上海大眾、華人社會的經營定位。既已設立傳統文士為目標客群，那麼在編輯過程中必然以讀者志趣為參考依據，逐漸轉型成《四溟瑣紀》便是此趨勢的最好證明。

之所以如此提出，蓋因彼時上海作為溝通中外的關鍵樞紐，¹⁰當西方文化堂而皇之地進入公眾視野，從而引發新舊傳統衝突與融會時，¹¹思考如何在商業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既穩固原有受眾市場，又能將體現人文內涵和社會現狀的廣博知識涵納，成了影響《申報》館人抉擇的重要因素。於是在此特殊的時代氛圍下，這種將傳統文學史料與新興商業期刊相結合的傳播模式，不僅揭示了部分當代士人在面對中、西方知識的接納程度和幽微心緒，亦能明晰此群體關注的議題面向和社會關懷，而《四溟瑣紀》便是呈現這段過渡歷史複雜特性的重要載體。

以濟世安民、格物致知之類為例，¹²《四溟瑣紀》雖仍是引應用科學之法建構，但作為切入點的選文，卻更偏向記述中國固有技藝手法的文章，¹³如第一卷至第四卷連載的陳裴之《澄懷堂文鈔卷·答查伯葵問西北水利書》、第五卷的汝南袁氏〈治河蠡測〉、¹⁴第七卷的〈治蝗說〉，以及第二、三、五、六卷、第八至第十二卷章鳴鶴著、范械士點校的《谷水舊聞》中，松江地方官員及鄉紳有利民生之紀錄，皆充分展現新編者群的實學觀點及選文標準，足以視為當代士人在傳統學術脈絡中找尋現代致用技法的表徵，亦詔示在當代原助益於西北史地學的研究工具，逐漸被轉化為欲裨益於世的實用手法。

結合稿酬制度尚未建立之時，¹⁵《申報》〈本館告白〉：「如有名言讜論，實有

¹⁰ 「自《南京條約》簽訂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以降，『聞』的中國界域打破，始而向外延伸擴張……其中，又以上海為中心不斷擴張形成的『海上』文化，扮演了溝通中外、推動聞見視域與文人知識轉變的關鍵要角。」見於黃龍彬：《新「聞」時代／海上報刊形塑與文人知識領域之重構（1853-1889）》，（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23年），呂文翠先生指導，頁2。

¹¹ 胡曉真認為，晚清數十年「其實都處於不斷的變動中，以變化為本質；舊傳統之解體、新傳統之發生、新舊之匯流與抗爭等等活動，都在同時進行」。筆者以為，此變動於上海地區尤為明顯。見於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臺北：麥田出版，2003年），頁301。

¹² 接續《瀛寰瑣紀》「思窮薄海內外，寰宇上下，驚奇駭怪之談，沈博絕麗之作，或可以參濟世安民之務，或可以益致知格物之神，或可以弄月吟風之趣。博搜廣採，冀成鉅觀。」見於〔清〕〈瀛寰瑣紀序〉，《瀛寰瑣紀》第一卷，（上海：申報館，同治十一年十月），頁2。

¹³ 《瀛寰瑣紀》第一卷曾刊載〈開關討源論 地震附見〉，據《申報》1872年9月23日第125號：「十九日早七點半鐘忽地震，由西而東，復由東而西，連動三次。今年金陵鎮江等處地震，本館前已錄入報中。」可知彼時上海剛經歷地震，可見編輯群體對時事的關注，但當時較偏重以西方科學的角度為中國知識分子提供參照體系。此外，關於「固有技藝」的說法，並非決斷的認定這些技法古已有之，且皆源於中華文化脈絡，筆者此處是以相對於當下才傳入的西方知識而論，那些於此之前已與多方新知融會，並實際應用於中國社會之技法，皆被筆者歸於此類。

¹⁴ 本文因主要著重在三篇以上海為核心論述之文章，故汝南袁氏的〈治河蠡測〉在後續不會多做探討。

¹⁵ 現代「稿酬」制度的真正建立與近代報刊出版業關聯甚深，特別是和《申報》館，就現存資料來看，目前首次公開表示會支付稿酬給作者的，即是1884年6月，《申報》館為《點石齋畫

繫乎國計民生，地利水源之類者，上官皇朝經濟之需，下知小民稼穡之苦，附登新報，概不取酬。」¹⁶的徵文需求觀之，皆反映出：伴隨西北史地研究興起而重新受到重視的經世實學思潮，在彼時已成爲《申報》主筆們的某種編輯共識。¹⁷

上述選文中，陳裴之（1794-1826）¹⁸作爲陳文述（1771-1845）之子，雖英年早逝，然因家學淵源，對於賑災、水利等實學頗有研究，¹⁹阮亨便曾言：「子嘆司馬（小雲）於東南水利洞悉源流，而不意司馬於西北水利已有成議。」²⁰可見其堅實的知識基礎，而在此之外，更重要的是陳氏父子於江南文士心中的地位；卷七〈治蝗說〉末尾，蔡爾康評此文可補《農政全書》的不足，《農政全書》作者徐光啓，便是明末上海著名的實學家，故蔡氏評語無疑使二者關係緊密勾連；《谷水舊聞》部分內容則載錄松江人物在地方上，種種有利民生之舉或是實學相關之事。綜合三者，編者群將陳氏父子的經世功績與文壇影響、徐光啓的務實觀點、松江官紳有益民生的作爲有系統地連載刊出，進而形構以上海爲核心的傳統實學網絡，並以之與嘉道以降逐漸發展成顯學的邊疆史地研究結合，欲穩固保守士人階層讀者群，同時又企圖與社會時事緊密貼合的目的昭然若揭。更值得關注的是，此三項稿源皆非作者自行投稿，而是編者有意選之，箇中深意值得深思。²¹

報》征稿時，刊出的〈招請各處名手畫新聞〉啟事。究其實，《申報》在創立之初，版面大致包括廣告、新聞、論說等內容，其中廣告大致會佔一半的篇幅，而刊登廣告是虛收取費用的。因此註 16 引文中的「概不取酬」，已是相當大的誠意。觀點參考自郭浩帆：〈近代稿酬制度的形成及其意義〉，《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 年 03 期，頁 83-89。

¹⁶ 引文爲〈本館告白〉，《申報》1872 年 4 月 30 日第 1 號，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¹⁷ 此處的實學概念並非王爾敏所定義的「晚清實學」而是「明清實學」，兩者的思想背景、研究宗旨、屬性內涵、演變影響皆不同。「晚清實學」乃是源於 1860-1895 年間的醞釀，王氏認爲於此期間「『實學』一詞，隱然改變新目標新內涵而爲人提倡」。雖說《申報》的創立被認爲是學術轉型的起步，但以傳統文士爲目標客群的《四溟瑣紀》其選文幾乎不見西方時事、文章，包含的實學內容諸如：農業、水利、荒政等，也不同於光緒二年至五年創設之「實學館」的教學科目，如：重學、電學、光學等；「明清實學」主要以「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爲價值核心，將學術研究的範圍從儒家經典擴大至自然、社會和思想文化領域，天文、地理、河槽、山嶽、風俗、兵革、田賦、典禮、制度等皆被囊括其中。「晚清實學」概念見於王爾敏：〈晚清實學思所表現的學術轉型之過渡〉，《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2 期，2006 年 6 月日，頁 19-51；「明清實學」概念見於王杰：〈論明清之際的經世實學思潮〉，《文史哲》，2001 年第 4 期（總第 265 期），頁 44-50。

¹⁸ 陳裴之，字孟楷，號小雲，別號朗玉山人，錢塘（今杭州）人。嘉慶十五年娶汪端（1793-1838）爲妻，道光六年歲暮亡，卒年三十三。

¹⁹ 鐵保和張芥皆曾表示頗爲賞識陳文述的治河、賑災能力，曾留陳文述於袁江輔佐宣防之役。此外，嘉慶十七年（1821）任職青村時開河竣工；道光元年（1821）任揚州江都縣宰時，爲瓜洲開河；也曾在江水暴漲時，派遣其弟陳鴻慶及其子陳裴之率領丁役、攜帶糧食四處賑災輔民。以上皆可見陳氏一門在治河方面的家學淵源。見於范正琦：〈陳文述及其著述研究〉，（江蘇：揚州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20 年，曹明升先生指導），頁 7-8、13-14、86。

²⁰ [清]阮亨：〈陳小雲司馬西北水利議·序〉，《澄懷堂文鈔卷》，清道光間刊本，頁 1。

²¹ 根據現有資料及學術成果大多指出，《申報》館之所以另闢《瀛寰瑣記》、《四溟瑣記》、《寰宇瑣記》等一系列綜合性刊物，便是爲了解決《申報》無法刊登如此大量文人投稿的情況，但誠如筆者所述，本文所舉的稿件皆無法改善此問題。又，作爲《四溟瑣記》主筆的錢昕伯於同一年（1875），亦同時主持編輯出版《申報館叢書》，此叢書卷帙浩繁，收錄許多地方性珍貴

而在此之前，江南社會正經歷「道光蕭條」帶來的一系列危機。「道光蕭條」係指中國十九世紀上葉嚴重的經濟衰退，此現象造成的影響延及晚清社會數十年。導致經濟困頓的成因相當複雜，其中一項便是因氣候劇變造成的災害危機，²²道光三年(1823)連月大雨引發的全國大範圍水災可被視為代表，史稱「癸未大水」。²³此次水患造成以上海為核心的江南地區遭受重創，陳裴之〈答查伯葵問西北水利書〉的寫作背景即為此，並曾作為解決計策，被實際應用於道光三年的丁沽決口事件中。²⁴

值得注意的是，《四溟瑣紀》除刊載多篇與實學相關的文章，亦延續自《瀛寰瑣紀》傳統，編錄多篇時人面對劫毀的相關書寫，即倖存者如何透過詩歌寄寓傷懷、撫平創傷，達到文化療癒的作用。然學界對此類討論，目前仍多以三略²⁵後的劫餘情境為研究範圍，而癸未大水當下造成的災害傷亡和社會重創，以及後續經濟衰退和糧食危機引發的種種問題，尚有待抉梳的空間。因筆者認為，依據上海文藝圈針對近代多場災害的重視和關注，²⁶於此特殊時期刊行這類作品的動機及背後囊括的意涵，乃至於傳統文士面對數千年未解之災害相關難題的態度，皆值得深入探析。

故本文擬以上述文章作為代表，探查筆政群如何在此公共文藝空間藉由選文，帶領讀者回到作者撰寫的時空語境，將欲傳達的社會關懷及面對時代災害的隱憂融注其中，藉以完整論述編輯群體欲透過選文達到社會實踐的企圖。使《四溟瑣紀》刊載之作品研究，不被囿於單純的文學價值分析，抑或是僅僅被置於報刊發展史以及現代性進程的脈絡下作為輔助材料。

二、癸未大水後上海地區的實學觀重建

文學史料，這與《四溟瑣記》刊登的地方史料及筆記叢談概念頗為相似。故而筆者才認為，編輯群體的選文意識應當深入探討。

²² 李伯重：〈「道光蕭條」與「癸未大水」——經濟衰退、氣候劇變及 19 世紀的危機在松江〉，《社會科學》2007 年第 6 期。

²³ 「國初以來承平日久，海內殷富為曠古所罕有。……至道光癸未（1823 年）大水，元氣頓耗，逮癸巳後無歲不荒。」〔清〕趙爾巽：《清史稿·食貨志·賦役》，（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2049。

²⁴ 〔清〕阮亨：〈陳小雲司馬西北水利議·序〉，《澄懷堂文鈔卷》，清道光間刊本，頁 1。

²⁵ 起自〔清〕毛祥麟《三略彙編》。三略分別指紀錄鴉片戰爭的《海疆記略》；紀錄上海小刀會起義的《會匪記略》；以及紀錄太平天國革命的《粵逆記略》。

²⁶ 以後續的「丁戊奇荒」為例，除李提摩太等傳教士發起的各項賑災、王韜於香港《循環日報》發起的募捐，《申報》、《萬國公報》等媒體的亦籌集善款，並刊行多篇相關報導，呼籲民間一同救災，其中便包括著名的〈鐵淚圖〉。皆可見滬上文藝圈之於近代災害的重視。其餘論述可詳見呂文翠：〈第二章 從《朝野新聞》看王韜與中日菁英詩文中的亞際文化融匯〉，《易代文心：晚清民初的海上文化賡續與新變》，（臺北：聯經出版，2016 年 12 月），頁 107-110。

予謂有聖人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興也。²⁷

國富則民強，反之，民困致使民變。就中國傳統社會層面而論，富須建立在包括糧食及經濟作物等農業穩定收成之上，故農政與治水自文明之始，便是歷代首要處理的重要工程，日常除了需建設水利用以灌溉農作，亦須建造河防解決疏泛，防止水患發生。

以明代徐光啓（1562-1633）為例，自翻譯《幾何原本》前六卷後，徐氏又於1607年先後譯著《測量法義》、《測量異同》，究其重視幾何學的深意，便是爲了提倡治河、水利：「西泰子之譯測量諸法也……，廣其術而以之治水、治田之利鉅、爲務急也，故先之」²⁸、「方今歷象之學，或歲月可緩，紛綸衆務，或非世道所急；至如西北治河、東南治水利，皆目前救時至計，然而欲尋禹績，恐此法終不可廢也。」²⁹之所以反覆提及，蓋因其所處時代，連年水澇、大旱、蝗災、鼠疫等災害正反覆席捲整個中國，故而迫切需要將西學融會至傳統實學之上，以挽救民生。

時隔二百餘年，江南地區於道光三年、十三年、二十九年（1823、1833、1849）前後遭逢數次大型水災，³⁰反覆的劫毀與重建，將原先富饒的土地浸泡成肥力盡失的受損樣態，³¹而松江又因地形之故成爲重災區。氣候劇變及土壤流失致使糧食、經濟作物長年歉收，農民進而無利可圖、無法維持生計，棉花紡織業也瀕臨破產。³²作爲中國重要賦稅來源的江南在多重打擊下，經濟自此進入長期衰退，從而造成中國嚴重財政問題，即吳承明所謂「道光蕭條」的重要表徵。最終，也成爲引發太平天國之亂及多場民變暴動的主因之一。

至《四溟瑣紀》刊行期間，雖上海城市景況已從災害後逐漸復甦，然心理創傷卻尚未痊癒，且仍有荒田缺乏整治，水利建設也無定期勘修。因此如何向讀者普及建設和治災技法，達到防患於未然之效果？又如何藉由媒體將地方官員、鄉紳有利民生之舉傳播，促使有志之士效仿？遂成爲報館編輯選文的重要評判標準。

²⁷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卷四，（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4月）。

²⁸ [明]徐光啓撰，王重民輯校：〈題測量法義〉，《徐光啓集》，（臺北：明文書局，1986年1月），頁82。

²⁹ [明]徐光啓撰，王重民輯校：〈句股義序〉，《徐光啓集》，頁83。

³⁰ 其中又以道光三年的癸未大水最爲嚴重，時任署布政司林則徐曾言：「蘇屬被災之重，爲從來所未有。……此數十萬飢餓餘生」

³¹ 「自癸未大水後，田腳遂薄。有力膏壅者所收亦僅二石，下者苟且插種，其所收往往獲不償費矣。地氣薄而農民困，農民困而收成益寡，故近今十歲，無歲不稱暗荒。」見於[清]姜皋：《浦泖農咨》，（上海：上海圖書館，1963年），第9、33、38段。

³² 姜皋：「棉花地荒歉者及今四年矣。棉本既貴，紡織無贏，只好坐食，故今歲之荒，竟无生路也。」見於[清]姜皋：《浦泖農咨》，第38段。

《四溟瑣紀》自開卷便連載四期的陳裴之〈答查伯葵問西北水利書〉一文，便充分展現編輯群體的多方考量。首先，本文撰寫之因乃係於「上年西北水患」，故陳氏以「汲汲也考之古史」為寫作方法，自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談起，為讀者建立歷史脈絡，而後分述說明在西北興修水利的十四「利」，此十四項以水利之利為核心，拓展論及至賦稅、徭役、兵屯、田墾等相關政策。整體言簡意賅、論述清晰，使讀者能快速掌握箇中要點，瞭解水利興修之於國家的重要性。其次，本文雖名曰西北，但因陳氏亦精通東南水利之故，內容花費極大篇幅細數各朝對水文之於灌溉的重視，以及說明中國歷代水利建設及治河工程的流變，實有助於晚清士人了解相關知識和技法，也能契合時下「藉西北，言東南」的時代風氣。第三，此文不僅列舉清初處理水患之策，亦曾作為解決計策，被實際應用於「癸未大水」之中，故能作為晚清治水和防災的參考依據。最後，編者延續《瀛寰瑣紀》選文慣例，先後載錄陳氏父子作品之舉，不僅能滿足舊有讀者群對於內容的喜好，亦能展現陳氏父子於香豔文學外的不同風貌及人物形象。

而陳裴之的對話對象——查伯揆（1770-1834），³³出身浙江海寧查氏南支第十五代，此氏族於明清兩代科甲鼎盛，³⁴在整個江南頗具影響力，也因積極入世，故對防災、治災有深入研究。如第十三代查開任河南中牟縣丞時，適逢陽河荊條決口，因其主張開掘引河，疏通故道，才使水勢得控制，後任河南武陟令時亦使當地兩年無水潦之災。³⁵第十四代查虞昌任池州知府時，築圩高三四尺，使二邑十餘年無水患。³⁶上述水利方面的建樹，不僅為氏族奠定良好家學傳承基礎，亦能啟發浙江地區文士群體對實學的關注。

而地方誌也紀錄：「查揆所到之處，必除暴安良，賑災興學，頗有政聲」³⁷，以道光五年查揆任永平知縣時為例，當時恰逢境內蝗災，查氏親率群眾撲滅蝗蟲兩千餘斤，次年又及時搜掘蝗蟲卵三千餘斤。與之相關的賑災紀錄雖僅與蝗災有關，然其對於民生、農政的關注卻不可忽視。

據《清史稿》及《清實錄》統計，於清廷統治的 267 年間，共有 119 年處於

³³ 查揆，又名初揆，字伯揆，號梅史，浙江海寧查氏南支第十五代，嘉慶九年舉人，著《簞古文集》、《菽原堂初集》。曾官安徽巢縣、順天蘇州知州（今蘇州）等職，卒於道光十四年溧州知府任所，年六十五。周駿富輯：《清史列傳》（九）卷七十一，〈文苑傳·查揆〉，（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頁 24。

³⁴ 據賴惠敏統計，明清兩代海寧查氏獲生員資格者 800 人，考取進士、貢生者 133 人。雖於雍正朝因查嗣庭文字獄一案歷經家族史低潮，牽連浙江人士數年禁止參加科考，查氏子弟或在獄中遭酷刑含冤而死，或遭貶謫發配邊疆，以致多數人皆庸碌一生。不過，查嗣璫季子——第十三代查開後又重振旗鼓，帶領海寧查氏走上另一個高峰。見於〈明清海寧查陳兩家族人口的研究〉，《大陸雜誌》，1989 年第 3 期、第 4 期。

³⁵ 《海寧州志·人物志》，見於《海寧查氏家族文化研究》，頁 18。

³⁶ 洪永鏗、賈文勝、賴燕波：《海寧查氏家族文化研究》，頁 125。

³⁷ 洪永鏗、賈文勝、賴燕波：《海寧查氏家族文化研究》，（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年 9 月），頁 126。

蝗災期，然實際上發生的頻次是遠超史實記載。經現代學者考察，僅光緒時期便有 31 年爆發，佔統治期的 91.2%，其中平均每 6-7 年便有一次大型或特大型蝗災。³⁸

徐光啓曾云：「凶饑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澤有偏被，水旱為災，尚多幸免之處；惟旱極而蝗，數千里間草木皆盡，或牛馬毛幡幟皆盡，其害尤慘，過於水旱也」。³⁹因蝗災對於作物生產的打擊是迅速且具毀滅性的，一但爆發便會造成程度不一的糧食危機，更重要的是，它多是伴隨旱災發生。故而情節嚴重者不僅會引起疫病橫生，還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動亂和經濟衰退，光緒初年造成上千萬餓殍的「丁戊奇荒」即是如此。⁴⁰

然「蝗災雖重，而除之則易，必合眾力共除之然後易」⁴¹，因此除了統治者需積極頒布治蝗旨令，並提前制定相關救災措施外，民間及地方自發性組織除蝗活動亦是不容小覷的力量。而若需發起，正確知識的普及便成為重中之重。

深諳此理的筆政群遂於《四溟瑣紀》第七卷刊登〈治蝗說〉，並於文後附上〈附治諸蟲法〉。雖未言明作者，但號為縷馨仙使的蔡爾康卻於文末云：「……原有焚之一法也，茲更推而言之，《農政全書》中又添一段議論，因亟錄之」。透過評論將此文的精確性與上海著名實業家徐光啓之著作劃上等號，其用意除了欲藉本地讀者對徐氏的肯定，從而提升對文章的信任外，筆者更大膽推測，此文有極大概率便是擷取徐氏《除蝗第三·屯田疏稿》一文之重點，以較平淺的詞彙條列撰寫而成，並就徐文未言及的部分進行增補。以下列出內容相近處：⁴²

《除蝗第三·屯田疏稿》	〈治蝗說〉
其二、已成蝻子，跳躍行動，便須開溝撲打。其法視蝻將到處，預掘長溝，深廣各二尺。溝中相去丈許，即作一坑，以便埋掩。多集人眾，不論老幼，悉要趨赴，沿	一曰埋。凡蝗生之地，掘一深坑，極長約里許，兩邊用竹梢木枝驚逐。蝗性喜類聚，一蝗反奔，眾蝗隨之。隨入坑中，即行掩埋，不能復出。又蝻子初生時，多集人眾

³⁸ 李鳳、劉文生、熊揚璐、潘孟楠、王發香：〈清代光緒年間的蝗災及治理〉，《百科知識》，2023年5月，頁5-7。

³⁹ 〔明〕徐光啓撰，王重民輯校：《除蝗第三·屯田疏稿》，《徐光啓集》，頁243-252。

⁴⁰ 丁戊奇荒雖主要以1877、1878年為主，然自光緒元年，即《四溟瑣記》刊行期間各地旱災現象已相繼出現。誠如筆者於註26所述，滬上文藝圈之於近代災害是相當重視的，故而此文的刊載，以及後續筆政群對「實學」的持續重視，是具有時代特殊性的。

⁴¹ 同前註。

⁴² 《四溟瑣紀》刊載的〈治蝗說〉及〈附治諸蟲法〉篇幅極短，二者相加僅兩頁，內容精簡。據筆者比對，與徐氏《除蝗第三·屯田疏稿》一文有多數內容相似之處，在此以表列之。文本檔案分別見於〔明〕徐光啓撰，王重民輯校：《除蝗第三·屯田疏稿》，《徐光啓集》，頁243-252。以及見於〔清〕章鳴鶴撰、〔清〕范械士點校：《谷水舊聞》，《四溟瑣紀》第七卷，（上海：申報館，光緒元年），頁1a-2b。

<p>溝擺列。或持帚，或持撲打器具，或持鍬鏟。每五十人用一人鳴鑼其後，蝻聞金聲，努力跳躍，或作或止，漸令近溝，臨溝即大擊不止。蝻蟲驚人溝中，勢如注水，衆各致力，掃者自掃，撲者自撲，埋者自埋，至溝坑俱滿而止。</p>	<p>預掘一溝，溝中相去丈許，即作一坑，或用帚掃，或持撲打器具，或持鍬鏟。每五十人用一人鳴鑼其後，蝻聞金聲，努力跳躍，或作或止，漸令近溝，鳴鑼不止，蝻蟲驚人溝中，衆各致力，掃者自掃，撲者自撲，埋者自埋，至溝坑俱滿而止。</p>
<p>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p>	<p>一曰焚。蝗聚處，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p>
<p>飛蝗見樹木成行，多翔而不下；見旌旗森列，亦翔而不下。農家多用長竿，挂衣裙之紅白光彩映日者，羣逐之亦不下也。又畏金聲砲聲，聞之遠舉。總不如用鳥銃入鐵砂或稻米，擊其前行，前行驚奮，後者隨之去矣。</p>	<p>一曰逐。蝗見樹木成行，及旌旗森列，多翔而不下。或用長竿挂紅白色衣裙白光彩映日，羣逐之，則不敢下。又畏金聲砲聲，聞而遠舉，用鳥鎗入鐵砂或稻米，擊其前行，前行驚奮，後者隨之去矣。或鳴鑼放爆竹亦可驅逐。</p>
<p>除蝗方：用稈草灰、石炭灰，等分爲細末，篩籬禾穀之上，蝗即不食。</p>	<p>一曰避。用稈草灰、石炭灰，等分爲細末，篩籬禾穀之上，蝗即不食。</p>
<p>臣按蝗蟲下子，必擇堅垆黑土高亢之處，用尾栽入土中下子，深不及一寸，仍留孔竅。且同生而羣飛羣食，其下子必同時地，勢如蜂窠，易尋覓也。一蝗所下十餘，形如豆粒，中止白汁，漸次充實，因而分顆；一粒中即有細子百餘。或云一生九十九子，不然也。夏月之子易成，八日內遇雨則爛壞，否則至十八日生蝻矣。冬月之子難生，至春而後生蝻，故遇臘雪春雨，則爛壞不成，亦非能入地千尺也。此種傳生，一石可至千石，故冬月掘除，尤爲急務。</p>	<p>一曰掘。蝻之法，前說詳矣。凡蝗蟲下子，必擇黑土高堅之處，入土中，不及一寸上留孔竅。蝗多時狀似蜂窠，最易尋覓。一蝗所下十餘，形如豆粒，中止白汁，漸次充實，因而成顆，一粒中即有細子百餘。或云一生九十九子，不然也。夏月之子易成，八日內遇雨即爛壞，否則至十八日生蝻矣。冬月之子難成，至春而後生蝻，遇臘雪春雨，亦爛壞不成。故冬月掘除，尤爲急務。</p>
<p>王禎《農書》言蝗不食芋桑，與水中菱芡；或言不食菉豆、豌豆、豇豆、大麻、苘蔴、芝麻、藜蘆。凡此諸種，農家宜兼種，以備不虞。</p>	<p>五法之外又有備荒之策，亦宜講求蝗不食芋桑、菉豆、豌豆、豇豆、大麻、苘蔴、芝麻之類，凡此諸種均宜兼種。</p>

結合〈治蝗說〉所言：「凡治法有五亟，錄於左以備檢閱，至官捕之法，前

人具有成說，茲不贅述。」可見編輯群體刊登此文的目的，確實是為讓民間及地方人士學習除蝗相關資訊，試圖運用刊物傳播知識予以最大限度的讀者群，可謂用心。而將內容、文字通俗化的展現，則可被視為舊式文人尚在摸索適用於新式傳播媒介的言述方式。

此外，《四溟瑣紀》中連載十一期的《谷水舊聞》中，亦包含多例實學內容，主要記載明代至清初松江一地，鄉紳及官員們於地方之義行，舉凡水利、農政、賦稅、民生事務等皆有涉略。如講述明代治水第一人——夏忠靖奉命治蘇松水利的過程，以及提攜治水後進的事蹟；⁴³陸樹德憐憫吳中賦役繁重，故而向上請命，將民運併入軍運；⁴⁴周文襄公為蘇、松、常三郡減免賦稅、設濟農倉、以儲賑貸等功績；⁴⁵徐壽於災荒時期以賑糧、借貸、勞力付出等多種形式協助貧苦百姓克服難關；⁴⁶婁令李公立均田役之法，使民困始蘇，亦促使鄰郡效仿；⁴⁷以及多筆捐義田、義莊，乃至於興辦義學之紀錄⁴⁸。

除了隱含希冀藉由撰寫舊聞掌故史志為人物立傳，並經由報刊媒體的傳播，突破家族內部乃至於地域侷限外，也寄寓將此類事例奉為模範，促進當代有能力

⁴³ 「夏忠靖奉命治蘇松水利，延詢父老，晝夜經營，盛暑不張蓋。浚黃浦，導洪水歸海。於蘇浚白茆塘、劉家河，水患乃息。……忠靖治水時，松人葉宗行、張賓揚建議浚范家浜，引黃浦水入海，夏從之，水患果息。忠靖薦二人於朝，葉知錢唐縣，多善政，人稱為『錢唐一葉清』；張官戶部員外，為權璫所憚，致仕後專以救貧恤孤為事，忠靖其知人哉！」見於〔清〕章鳴鶴撰、〔清〕范棫士點校：《谷水舊聞》，《四溟瑣紀》第三卷，（上海：申報館，光緒元年），頁 13a。

⁴⁴ 「陸中丞阜南名樹德，隆慶六年，樹德任禮科給事中，憫吳中賦役繁重，民運白糧，為漕卒所，因疏其狀以聞，並請以民運併入軍運。得旨報可。噫！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見於〔清〕章鳴鶴撰、〔清〕范棫士點校：《谷水舊聞》，《四溟瑣紀》第十卷，（上海：申報館，光緒元年），頁 2。頁 6a。

⁴⁵ 「周文襄公為巡撫十九年，多惠政。蘇、松、常三郡，積欠糧數十萬石，疏請蠲免。時漕政漸壞，公涖任後，正糧一石只加耗一斗；金花銀一兩折米四斗。又嘗設濟農倉，以儲賑貸，民咸德之。」見於〔清〕章鳴鶴撰、〔清〕范棫士點校：《谷水舊聞》，《四溟瑣紀》第二卷，（上海：申報館，光緒元年），頁 25b。

⁴⁶ 「明嘉靖甲辰，江南歲祲。……於是籍里中貧戶量口給粟，間有無錢者則貸之棉花，令織布以易粟；不能織而有力者，則使之舂。若老弱不任役者，為之施賑。」見於〔清〕章鳴鶴撰、〔清〕范棫士點校：《谷水舊聞》，《四溟瑣紀》第三卷，（上海：申報館，光緒元年），頁 13b。

⁴⁷ 「松郡向坐役困，康熙六年，婁令李公始立均田役之法，民困始蘇。隣郡亦仿而行之。」見於〔清〕章鳴鶴撰、〔清〕范棫士點校：《谷水舊聞》，《四溟瑣紀》第八卷，（上海：申報館，光緒元年），頁 8b。

⁴⁸ 「捐田贍族，我松向無舉行。成化間，顧太守草堂建義田，以恤宗族。孫東川、曾孫少川，皆能繼先志。新橋里人王緒，於族有貧者割田賑之，得六百餘畝，邑候李繼周、鮑奇謨皆旌其門。近張得天嘗稱，其弟祖淇割十頃產作義莊。」見於〔清〕章鳴鶴撰、〔清〕范棫士點校：《谷水舊聞》，《四溟瑣紀》第二卷，（上海：申報館，光緒元年），頁 23b。、「徐司寇陟捐學田百畝於府縣各學，贍諸生之貧者，別捐田二百畝，為四學廣文灑掃之費，並捐房四十餘楹，以處諸生，一時咸頌其德，今則盡入於學官矣。」見於〔清〕章鳴鶴撰、〔清〕范棫士點校：《谷水舊聞》，《四溟瑣紀》第三卷，（上海：申報館，光緒元年），頁 16a。、「陸義士名文貴。……時倭寇東南，賦役繁重，陸盡出其田輸縣官，以拯里中之困。」見於〔清〕章鳴鶴撰、〔清〕范棫士點校：《谷水舊聞》，《四溟瑣紀》第十卷，（上海：申報館，光緒元年），頁 5b。

者效仿前賢、共體時艱，盡己所能改善百姓生計。

經由上述自水利至農政，再到民生事務等細緻考察，可以發現編輯群體藉由選文，清楚呈現上海地區自劫毀後對於實學的重視，以及欲將知識普及的意圖，並運用文本背後蘊藉之深意將其連貫，不僅呈現文人及其家族更為豐富多元的面貌，亦能追溯承繼自徐光啓建立的實學譜系，並將之與時下自西北史地研究興起的經世風潮相結合，完整建構上海地區的實學文脈，饒具歷史意義。

三、西北史地研究在上海的延續與轉化

在確實傳播益民之舉，並將傳統治水及治蝗技法知識普及，為上海知識分子建立實學觀念後，編輯群體亦將自身濟世安民、格物致知的想法鑄鑄於經世致用的概念上，使之與社會時事及學術風潮緊密貼合。

中國傳統經世之學的譜系可溯及至明末清初時期，儒學之於空疏理學的反動，隨著時代發展，其囊括的概念、意涵和面向逐漸擴大、轉換，其中便包括「重道輕藝」的觀念異動以及「西學東漸」的思想影響，⁴⁹即原先較不受重視的社會學及自然科學，諸如賦稅、水利、農政、荒政等皆成專門之學，被納入實學之列。這與徐光啓終其一生提倡為學應「務求實用」、有用於世，並志在「率天下之人而歸於實用」⁵⁰的思想脈絡息息相關。某整程度上而言，是對傳統經史之學的消解與拓展，亦醞藉了中國學術自「舊學」走向「新學」的遞嬗意義。⁵¹而本節欲探討的便是自清中葉「西北史地研究」承衍而來的經世實學思想，是如何被轉型並應用於上海報業，成為大眾傳播者與接受者交流的中介與樞紐。

邊疆史地之學自生成之初即為一種與國家利益緊密相關的「經世之學」。迨至 19 世紀中後期，中國北部、西北與西南邊疆的領土多有喪失，劃界爭端應接不暇。……大約同一時期，因東南海疆危機加深，一些傳統社會的知識精英開始「睜眼看世界」，寄情於海防地理著述的編撰或刊刻，旨在以自身之謀斷為國家所採擇。毫無疑問，無論是「籌邊」的邊界論說，還是「籌海」的海防思想闡發，這

⁴⁹ 「中國實學除了繼承和發展傳統儒學的「經世之學」外，隨著士人的『重道輕藝』觀念的根本轉變和『西學東漸』的思想影響，開創了重實踐、重驗證、重實測的『實測之學』，這是漢唐儒學所不具有的。」見於葛榮晉：〈評中國實學研究的「泛化」與「窄化」〉，收錄於澳門中國哲學會編：《21 世紀中國實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 2 月），頁 16-17。

⁵⁰ 〔明〕徐光啓撰，王重民輯校：〈幾何原本雜議〉，《徐光啓集》，（臺北：明文書局，1986 年 1 月）頁 76。

⁵¹ 黃長義：〈經世實學與中國學術的近代轉型〉，《江漢論壇》，2005 年 12 期，頁 86-92。

一時期的知識精英已將自身學術旨趣和國家命運聯繫在一起，希冀藉邊疆史地之學以有補於「制夷」。⁵²

值得注意的是，清中葉西北史地學人對經世之學的理解，並非緣起於邊疆危機，而是始於當廣袤的新疆重歸版圖時，他們對於中國大一統的鼎盛繁華想像，是自道光以降才將之轉化，有了抵禦外侮之意。⁵³

究其實，中國實學本是內容極為複雜的多層次概念，自北宋始被提倡起，「實體」與「達用」便是其不可分割的主要內容，因「『實體』是『達用』的理論基礎，而『達用』則是『實體』的外在表現」。⁵⁴此核心概念遂於後代社會變革時屢次被提出，特別是需建構或涵納其他知識之際，如徐光啓在譯介西方知識時便曾指出，利瑪竇等泰西諸君子所言「必可以補儒易佛」，之所以具此效用，蓋因其傳播的「格物窮理之學」和「象數之學」，皆包含「實心、實行、實學」，故有志者應放下成見，適度的吸收、將與中國傳統知識融會，最終以之為器並用於世。

55

道咸之際，紊亂的社會危機與時代氛圍催動有志於西北史地的文士自乾嘉考據的學風中復甦，紛紛思考該如何將輿地之技轉為有用之學，使「實事求是」的精神延伸到「學以用世」的方法之上，包括鹽業、漕運、河工在內等實學，相繼被提出用以來履行經世概念。⁵⁶西北史地研究所蘊含的經世意識，也是在此時逐漸被轉化為欲裨益於世的實用手法。⁵⁷

事實上，編輯群體之所以擇用延續自西北史地研究的經世實學思想，而非時下主流的「中體西用」之說，主要原因還是與目標群體有所關涉。《四溟瑣紀》刊行期間，部分文士對於西方科學及知識還是持保留甚至是抵觸的態度，⁵⁸因此，

⁵² 馮建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通變與勵進〉，《歷史研究》2020年第一期。

⁵³ 概念整合自徐萬民：〈序〉，收錄於郭麗萍：《絕域與絕學：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12月），頁1-5。

⁵⁴ 葛榮晉：〈評中國實學研究的「泛化」與「窄化」〉，頁3。

⁵⁵ 徐光啓：〈泰西水利序〉，見於徐光啓著，王重民輯校：《徐光啓集》，（臺北：明文書局，1986年1月），頁66-68。

⁵⁶ 「乾嘉以後講經世致用者更傾向於講實用，失去指向性的致用常被視為空泛的迂談。……嘉道年間講經世致用大致在兩個層面：講求治法，研究鹽業、漕運、河工、賦役、銓選、保甲等」。見於郭麗萍：《絕域與絕學：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研究》，頁204-205。

⁵⁷ 梁啟超將清代地理學研究分為三期，其中「第三期道咸間，以考古的精神推及於邊徼，浸假更推及於域外，則初期（順康間）致用之精神漸次復活」的說法，充分說明西北史地研究於此時期的發展及轉變。見於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388頁。

⁵⁸ 如時人陳留樹便曾於《瀛寰瑣紀》中言：「中國自開闢以來，數千年於茲，雖無治水機器，亘古未有不治之水；雖無耕田機器，亘古未有不闢之田，……天下事無利於西法者類如此。」明確表達中國無需西方科技幫助的主張。誠如陳佩潔所述：

若欲迎合讀者喜好，那麼以傳統文獻考據為圭臬，並且包含用世意識的輿地研究，便成為傳播者與接受者間良好的溝通橋樑。

此外，雖說承繼自徐光啓的實學觀念以及明清之際「西學東漸」的思潮，與西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但對於同光時期特別是上海地區的文士而言，這些概念早已內化並實際應用在中國固有的技藝之中，成為明清實學極為重要的一環。更重要的是，其所展現的務實學風及經世致用的社會功能，正是近代社會迫切需要的治世良方。因此，若說伴隨上海開埠而來的是西方文化如浪潮般的衝擊，那麼源於中華文脈的知識傳承與重構，便是足以穩固人心的重要關鍵。

西北史地研究於《申報》館人最大的啟發，莫過於加強對現實問題的關注，並延伸思索「學的內涵」、「技的方法」以及「用的途徑」三者間的關聯，他們清楚認知，「學」是「技」的目的，當「技」達於「學」，「學」才能「用」於世，而若欲將此概念應用至《四溟瑣紀》，那麼作為第一卷的實學選文代表便至關重要。

陳裴之作為西北史地研究代表之一——龔自珍（1792-1841）的親屬，⁵⁹自嘉慶末年便開始關注西北水利，並曾撰詩予以龔氏云：「不才未敢學君狂，湖海豪情也未忘。西北果能興水利，東南始可論河防」。⁶⁰而後陳裴之又於京中結識另一位標竿人物——徐松（1781-1848），志趣相投下甚至還為徐松《新疆賦》題寫識語。除上述交遊外，其妻汪端亦言：「（陳裴之）留意於天文、地理、兵法、河渠、錢谷、鹽漕、農田、水利等書，精研窮究，燦若列眉。……每當賓筵廣座，縱論天下大計，風發泉涌，慷慨激昂。」⁶¹

總體而言，無論以陳裴之與西北史地研究群體的密切交流、對於江南文士的身份影響，抑或自身學識的精確性與廣博性，皆為最適合不過之選。因此《四溟瑣紀》自開卷便連續四期刊載其〈答查伯葵問西北水利書〉，便是希冀能在上述原因的奠基之下，藉由在新興的公共文藝平台，載錄屬於傳統輿地研究範疇的「學」，並將內容記述的治水之「技」視為工具，與當代災害相關問題結合，達到濟於世「用」的目的。如此標準亦為刊物後續的實學選文確立基調，故編錄第七卷〈治蝗說〉的概念亦是如此。

「同治中興時期的士人大約可以分成兩派：一者為接受西方新知，並與自身傳統所學結合的融會貫通之人，一者對西方抱持猶疑態度，對於中國長年傳授的知識比較信任的保守之人。」見於陳佩潔：《追憶與重建——論《申報》館第一份文藝期刊《瀛寰瑣紀》的文化復興》，（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23年），呂文翠先生指導，頁74。

⁵⁹ 陳裴之之母、陳文述之妻龔宜人為龔自珍遠房親屬。《頤道堂文鈔》附《先室龔宜人傳》：「宜人姓龔氏，仁和人，初名潤，字雨卿，後名玉晨，字羽卿。祖岷山公，諱導江，乾隆丙辰科進士，官山西壽陽令。父快哉公，名耘，字春林，後名樂，太學生。兄凝祚，字素山，仁和諸生候選布政司理問。」見於〔清〕陳文述《先室龔宜人傳》，《頤道堂文鈔》，清道光十八年增刻本。

⁶⁰ 〔清〕陳裴之〈贈龔定庵明經，即題所著詩古文詞後〉，《澄懷堂詩外》卷二，道光三年重刻本。

⁶¹ 〔清〕汪端：《夢玉生事略》，陳裴之《澄懷堂詩集》卷首，道光三年重刻本。

有別於前二者，《谷水舊聞》如此藉由總結經驗，寓經世之意於史學的概念，則更偏向全祖望（1705-1755）的經史研究方法。全氏畢生致力於透過整理歷史文獻，表彰明清之際抗清的忠烈之士及鄉里先賢，以客觀的角度為後世留下了生活史的真實紀錄和地方風俗掌故，彌補主流史志之缺失。⁶²此種治學之法係承繼自黃宗羲所開創的浙東學派，編輯群體刊錄《谷水舊聞》的目的，便是欲將此考訂完善的文獻「定為一代之規模」，達到「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坐而行耳」⁶³的效果。而之所以於此時期刊載，實與歷經多場劫毀後，清朝官方的修志風潮息息相關，故此舉其實也隱含響應官方，一同建構上海歷史脈絡的文化意涵，⁶⁴清楚呈現史學經世的概念如何被應用至近代實學思潮。

此外，《谷水舊聞》之內容，除了如前一節所述，以頌揚功績樹立楷模外，也包含抨擊時弊、關心民瘼的相關紀述，如某官吏因侵占振災的國帑，致使莫名家破人亡的事例，⁶⁵相當程度映現了時人對於晚清政治腐敗的不滿，故而希冀藉由刊載此類訊息，達到革新時弊的成效。

藉由上述例證，明確體現《四溟瑣紀》編輯群體在面對日益嚴重的邊疆危機時，有別於同時期其他報刊的選文思維，既不擇用西方文學及圖誌，倡導科學精神和方法，也不順應官方主流的「中體西用」概念，以西學糾正傳統學術之弊，挽救日益嚴峻的社會問題，而是延續《申報》重現讀者的立場，站在受眾的角度思考，以選文來展現因應時局的態度，透過編者／作者與讀者共同關注的切身時事話題，塑造密切的共同群體關係，再與具顯學之勢的西北史地學勾連，試圖達到起舊圖新的效果，足以視為當代士人在傳統學術脈絡中找尋現代致用技法的表徵，而這一切皆與編輯群體賦予自身的社會責任與價值實踐有所關涉。

四、報刊媒體興起與建立之於智識群體社會實踐模式的影響

⁶² 「全祖望終身矢志不移、孜孜以求的一項工作，是搜集整理晚明史事以表彰忠義，熱情輯校鄉邦文獻以傳承地方文化。」見於孫邦金：〈全祖望的經史研究及其對乾嘉學風的影響〉，《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0年5月第23卷第3期，頁65-70。

⁶³ 黃宗羲高足萬斯同曾言：「將盡取古今經國之大獻，而一一詳究其始末，斟酌其確當，定為一代之規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坐而行耳。」見於〔清〕萬斯同：《石園文集·與從子貞一書》，《續修四庫全書》。

⁶⁴ 黃龍彬指出自1866年起，因上海縣民提出重修方志之請，遂開啟官方從上海縣邑一路擴展到松江府境的修志風潮。其目的是希望藉由廣溯松江宗脈，以「全面鑑照上海的前世今生」，如此不僅能提供為政者鑑往知來的借鏡功效，釐清未來的治理方向，亦能重修整自劫毀後遭到破壞的當地文史紀錄。概念整合自黃龍彬：《新「聞」時代／海上報刊形塑與文人知識領域之重構（1853-1889）》，呂文翠先生指導，頁180-185。

⁶⁵ 「康熙丁交，松江因旱而饑，奉旨蠲本年糧米百萬有奇，發國帑賑貧民，中飽於官吏里書者十之七，縣吏某因之致富。後某病，口中曉曉言侵帑事，未幾死，二子皆死，家亦亡。」見於〔清〕章鳴鶴撰、〔清〕范棫士點校：《谷水舊聞》，頁20。

十九世紀，中國在「道光蕭條」及「癸未大水」後，又接連遭逢大規模水災、旱災及蝗災等自然災害，氣候劇烈變遷、人為治災疏失以及外患頻繁進犯等諸多問題，從而成爲引發太平天國、捻亂、陝甘回變、新疆回變等內亂的導火索。至光緒初年，儘管多數叛亂已平定，然歷經劫毀的清廷社會已是滿目瘡痍。故編者群於此特殊時期刊行這類作品的動機及意涵，是否囊括面對時代災害的隱憂和關懷？另外，是否具有以文學進行文化療癒，從而衍生激勵讀者的效益？

誠如魯道夫·瓦格納（Rudolf G. Wagner）所言：「他們是一群剛經歷過一場毀滅性內戰帶來創傷的有閒階層」，⁶⁶因此儘管《四溟瑣紀》作爲《申報》出版之文學期刊，辦報目標及經營策略也大致遵循慣例，以「營業圖利」爲目標，但作爲上海本地士人的筆政群，依然能在迎合讀者喜好的同時，透過選文決定輿論風向，甚至是影響讀者關注的議題及閱讀偏好，將自身理念以及社會關懷暗藏在整個新式媒體的傳播過程之中。⁶⁷

不同於面對三略劫餘情境，是透過紀念書寫表彰戰亂後逝世的節烈婦女、爲忠義之士立傳，從而達到文化療癒的作用，《四溟瑣紀》中的實學文章更多是以避免災害／悲劇重演的角度出發。這是一種賦予生者在知識上重新建構勇氣，並自傷處再次起身甚至前行的療方，且這個方子還必須是源於中國傳統學識的脈絡體系，此乃因其更易接納之故。

那麼何以作爲落第學子的編輯群體，⁶⁸在化身洋場才子後，便能以此種形式完成自我實踐？這與知識分子社會功能機制的轉變，從而使中國文人得以加入新式傳播媒體，改變與讀者群間的關係有所牽涉。

智識份子由於廣義社會經濟力之支撐，使其依附性降低，因而展現較大之

⁶⁶ 「而（《瀛寰瑣紀》作者和讀者的共同群體開始形成，他們擁有同樣廣泛的文化興趣，標舉自己爲『大雅君子』。他們對『世界』充滿興趣，但並不崇拜所有『西方』事物，並且與瑣碎內容的誇張框架保持反諷式的距離。他們是一群剛經歷過一場毀滅性內戰帶來創傷的有閒階層。」魯道夫·瓦格納（Rudolf G. Wagner）撰，季劍青譯：〈媒體、文學和早期中國現代性〉，《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臺北：麥田出版，2021年1月），頁137。

⁶⁷ 此觀點受啟自李仁淵針對《申報》改變當時新式傳播工具角色的相關論述。李仁淵認爲儘管《申報》辦報的主要目的是以「營業圖利」爲目標，但在引發讀者興趣，引發購買慾望的同時，「報刊編輯仍可以從中間接傳遞自己的信念（如勸人爲善），但主要仍是要投合讀者的喜好，儘管報刊本身同時也操縱了讀者的『喜好』，決定讓什麼事成爲『話題』，成爲眾人口中談論的對象」，而此性質，也使辦刊和讀者間的互動關係愈發緊密，故「報刊要做的另一件事便是找尋或塑造出無名讀者們『共同』會感興趣的話題，並且站在他們這一邊思考。而這些『話題』，通常就是那些最切身、即時且最普通的事務，例如：……甚至避免災難，尤其在未來難以預測的情形下？」，見於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爲中心的討論》，（新北：稻鄉出版，2013年9月），頁69-70。

⁶⁸ 「彼時朝野清平，海隅無事，……而全國優秀分子，大都醉心科舉，無人肯從事於新聞事業。惟落拓文人，疏狂學子，或借新聞以發抒其抑鬱無聊之意興。」見於〔清〕雷瑒：〈申報館之過去狀況〉，《1872-1922 最近之五十年：申報館五十周年紀念》，（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1月1日），頁27。

自主性。……私人教育之逐漸普及、文字使用需求之增加等因素，從而使其階層基礎擴大。其間商業經營對知識人才之需求，更使智識階層增添出不同以往之社會功能。⁶⁹

戴景賢根據章學誠（1738-1801）劃分浙東學派及浙西學派之言，⁷⁰提出自清初，即出現「以『地域』作為關連『學術』、『思想』與『智慧群體』之文化場域」的現象，於是藉此延伸探討明清社會在「地域性文化孕育過程中，其所積累由城鎮文化，乃至於城市文明所帶動之社會功能之發展」，並提出此發展的一項重要表徵，便是知識分子／智識群體在過程中造成的社會功能轉變。

以《四溟瑣紀》發行地——上海為例，作為近代中國公共領域的中心，自 1843 年開埠後，基於租界區的政治因素，多方勢力於此相互制衡形成特殊的獨立性，進而造就紙媒在開放的風氣下普遍通行，公眾也慣以閱讀題材為核心交流、對事物進行批判。⁷¹在如此特殊的時代背景及複雜的社會結構下，催化城市迅速發展，對於中文知識分子的需求隨之增大，故此群體的功能及肩負的責任不僅愈發廣泛，部分功能機制亦產生變化。

雖就文人求仕的角度來看，作為《四溟瑣紀》主筆的錢昕伯和蔡爾康，皆未達到傳統意義上的成功，⁷²但這些通曉經典的文人（classically literate），儘管無法透過登科、及第成為所謂「官僚精英」，但他們仍能依循對於公共事務的興趣，乃至於對國家命運的使命感，以一種全國性的視野參與政治、應對挑戰，⁷³而

⁶⁹ 戴景賢：〈市鎮文化背景與中國早期近代智識群體——論清乾隆嘉慶時期吳皖之學之興起與影響〉，《文與哲》，2008 年 12 月第十三期，頁 219-270。

⁷⁰ 〈浙東學術〉：「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見於〔清〕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523。

⁷¹ 「公共領域的出現，有兩個很重要的條件：一是從私人領域中發展出公共交往的空間，伴隨書籍、雜誌、報紙的日常生活化，出現有教養的閱讀公眾，這些公眾以閱讀為中介、以交流為核心，逐漸形成開放的、批判的公共領域。二是公共領域討論的雖然是公共政治問題，但本身是非政治化的，是在政治權力之外建構的公共討論空間，相對於權力系統來說擁有獨立性。」見於許紀霖：〈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形態、功能與自我理解——以上海為例〉，《史林》，2003 年第 2 期，頁 77-89。

⁷² 錢昕伯與蔡爾康最高的仕途位階皆為秀才，爾後都屢試未中，蔡氏更以「堂備滿薦，八試不售」敘述其多年的鄉試挫敗過程。引文見於〔清〕蔡爾康：〈先妣沈太安人行述〉，收錄於〔清〕林樂知主編：《萬國公報》第 92 卷，（臺北：華文書局，1968 年），頁 16339。

⁷³ 孔飛力(Philip A. Kuhn)根據艾爾曼(Benjamin Elman)在“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l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中的說法，將曉經典的文人(classically literate)規範成「文化精英」，並提出由於科舉考生人數與功名定額太過懸殊，故登科和落榜的結果不足以說明考生能力上的差距。而這些飽讀經書的落第秀才儘管無法進入官場一展雄才，然卻可投身在廣義的社會政治參與活動上實踐理念，諸如參與地方事務、編纂史志、擔任幕僚等。而筆者認為，在新興的報刊媒體上藉由選文表述自身的經世想法也不失為一種方法。內容整合自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陳兼、陳之宏譯：〈導論〉《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年 1 月），頁 14-20。

近代報業的興起無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台。⁷⁴於是，中國早期的報人們便藉由身份功能與責任的轉變，將那些官場之外的「社會」聲音，在這個新興的「公共空間」上傳播。⁷⁵

跟其他資本主義化的商品不同的是，報刊這種「文化商品」本身的價值與影響力並不僅出自於物質本身，而更出自其上所負載的文化意義。如果負載文化意義的符號，無論因為內緣或外緣、經濟社會抑或本身內在因素，其傳播方式發生改變，影響必然廣及整體的思想與文化。⁷⁶

可以這麼說，《四溟瑣紀》作為載體的同時，無形之中亦成為標誌當代文化的一部分，而這些洋場才子便是編輯符碼的推手。他們首先從商業經營角度出發，將智識群體預設為讀者，有意識地擇用符合目標客群偏好的語言、⁷⁷曆法、標點及版式，營造出編者、作者與讀者為一共同體的概念，再運用符合江南士子審美意趣的詩文，表述自身偏好與之相同，為報刊積累忠實觀者的同時亦製造共感，深化群我關係，以降低士人對於報刊的戒心，最終，把欲傳達的意義、欲關注的話題穿插其中。巧妙運用傳播方式的改變，擴大影響力，扭轉自身價值。

而此過程中，向上回溯自明代徐光啓開啟的實學譜系便顯得至關重要。連結至前述戴景賢提及的「地域性文化」，可以明顯看出這些置身「海上」⁷⁸的編輯群體，有意以地域為核心，透過選文建構出本地的實學文脈，並運用報刊將之闡揚到全國，於此公共場域和社會進行交流。

⁷⁴ 田中初曾針對蔡爾康對入仕之途欲斷還連的情結開展以下論述：「變動產生新聞，處於變動時期的人們也渴望通過報刊來瞭解社會。蔡爾康正是抓住這一機會，密切關注時局變化，從而使蔡爾康和他所經辦的報刊在近代中國變革中發揮信息傳播和輿論導向的重要作用」，進而說明中國早期報人「雖然客觀上在為洋人服務，但在政治上並不是無所作為」。見於田中初：〈游離中西之間的職業生存——晚清報人蔡爾康述評〉，《新聞與傳播研究》，2004年03期，頁44-50。

⁷⁵ 李歐梵曾根據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對「公共空間」、「公民社會」的論述提出異議，他認為上述二詞不該被混為一談，因為「公共」不一定指涉公民領域，並說明我們更應該關注梁啟超所言之「群」和「新民」的概念，如何落實到報紙，進而產生影響。最後據此觀點提出：這些逐漸演變成官場以外的「社會」／「公共」聲音，是如何形成？以何種形式表現？等問題。見於李歐梵：〈「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收錄於汪暉、徐國良編：《上海：城市、社會與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51-170。

⁷⁶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頁65-66。

⁷⁷ 「在每一個案例裏，語言的『選擇』顯然都是逐漸的、不自覺的、實用主義的——更不用說是偶然的——發展過程。」見於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k Anderson）作，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1999年6月），頁52。

⁷⁸ 「海上」一詞是晚清以降，上海文化圈對本地之別稱。呂文翠認為其意涵「非徒標示區域地名或行政單位劃分」，它對外是通往異域、異文化之門戶，對內則在空間地域上呈擴張趨勢，具有「提升文明、擢拔人之識見的同化力」。見於呂文翠：《易代文心：晚清民初的海上文化賡續與新變》，頁10-11。

陳裴之〈答查伯葵問西北水利書〉、〈治蝗說〉，以及章鳴鶴著、范穉士點校的《谷水舊聞》，此三篇與上海具密切關係的選文，雖皆涉及實學知識記述，然其文字背後所代表的卻是不同的層次及面向。

以縱向的歷史角度觀之，他們將徐光啓視為上海實學文脈的濫觴，經世致用成了揭櫫箇中的關鍵，從明末清初的概念提出，到乾嘉考據學的隱匿消退，至道光以後的百花齊放，三篇選文所囊括的意義，不僅代表了各階段觀念的此消彼長，更是動態歷史範疇下反覆辯證的過程，同時也反映了清代社會、政治乃至於學術的多重轉向。

以橫向的實學視閥切入，他們將自身的經世思想融入晚清社會變革的浪潮，並將西北史地學的核心觀念挪用，為明清實學注入新的概念和內容，並以之建構多層次的社會概念，試圖藉由大眾媒體的傳播能力，引導讀者將焦點目光投注在劫毀後的災害重建及心靈修復之上，從而對傳統學術、價值觀進行重新評估判斷，為社會提供一種新的價值導向，引導有志之士走出時代困局。

面對蝸蟻國事，編輯群體作為落第學子，雖無法透過任官擠身主流進而施展滿腔抱負，但身處晚清上海這個於新舊文化過渡時期，相對開放能接受創新、變革的城市，這批不在官場的「準政治性」精英人物，⁷⁹仍可以新穎的傳播媒介，參與「編纂地方誌、促進或維護地方文化及歷史」，回應中國文士「以天下為己任」的普遍信念，⁸⁰抑或是藉由選用、點評文章來表述自身的觀點及立場，並於公共文藝空間與社會進行對話，激盪出不一樣的討論和火花。

此種社會實踐的模式，相當程度映現了在晚清多變的時代氛圍中，知識群體一方面積極站在港埠遠眺海的彼端，希冀將西方知識援為我用時，另一方面在致力向內溯源，先是藉由報刊媒體興起與建立對社會結構造成的改變，從中找尋足以安身立命的位置，再透過編選文章內塑自我，深化以上海為核心的江南士子對地域和文化精神的認同及關注。清楚勾勒傳統士人在西方浪潮衝擊下，欲將上海實學文脈中傳承下來的知識進行革新、改造，嘗試突破「言新學則不厲詞章，詞章之士抗拒新學」對峙窘境的企圖，標誌著以洋場才子為代表的群體，在晚清文化遞嬗過程中，救國濟世的思緒如何在報刊中形構，相當程度表述了當代有志之士的心跡。

⁷⁹ 關於「準政治性」的論述，參見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著，葉光庭等合譯，陳橋驛校：〈城市與體方體系層級〉《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12月），頁327-417。

⁸⁰ 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陳兼、陳之宏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頁16。

五、結語

雖《四溟瑣紀》在出滿十二期後，便於光緒二年（1876）二月再次更名，而後一年，隨著《寰宇瑣紀》的停刊，「申報三瑣紀」遂走入歷史的長河。然作為中國第一份文學期刊及其續刊，對於當代的影響和後世的時代意義都是無庸置疑的。

過去論及《四溟瑣紀》，多將其置於《申報》對近代訊息傳播模式，以及經營策略改變等外部的框架下一併論述，針對內部洋場才子們複雜的編輯深意，乃至於透過剖析選文闡釋其思緒軌跡者甚少。有鑑於此，筆者首先由「癸未大水」、「道光蕭條」等時代災害作為背景切入，向上回溯自明代徐光啓重視幾何學之因，以此勾勒上海實學文脈建立的雛形，而後將時代推延至二百餘年後再次遭遇劫毀的江南地區，曲折譜寫出作為「文化菁英」的編輯群體，如何嘗試透過新式傳播媒體，向讀者廣泛地普及治災技法，達到防患於未然之效果，甚至是將地方官員、鄉紳有利民生之舉傳播，促使有志之士效仿。

究此想法的深層意涵，乃是源自於編輯群體欲將自身想法鑄鑄於經世致用的概念上，並與社會時事及學術風潮緊密貼合。他們首先延續《申報》重現讀者的立場，藉由擇用符合江南文士審美喜好的文人文章，搭配編者／作者與讀者相同關注的切身話題，塑造密切的共同群體關係，再運用於當代被視作顯學，並被實際應用於邊疆危機的西北史地學觀點切入，足以視為當代士人在傳統學術脈絡中找尋現代致用技法的表徵。最終，在達到報刊商業盈利目標的同時，亦能從中隱晦表露於晚清時期，士人應當盡己所能報效家國的意圖和自覺。

延續孔飛力對於帝制晚期「文化菁英」在官場之外一展長才的說法，筆者認為在知識分子／智識群體社會功能逐漸轉變、擴大的時代氛圍中，於報刊這個新式傳播媒體上實踐抱負、和大眾進行交流，無疑成了履行的不錯渠道，特別是在《申報》館這個專門任用本地文人為編輯的平台上。

於是，他們懷揣對災害危機的隱憂和關懷，以避免災害／悲劇重演的角度出發，運用文學進行文化療癒，進而激勵讀者生發勇氣。從文章的選用，亦可看出欲藉由追溯自徐光啓開創的實學譜系，建立上海實學文脈的企圖，為本地歷史人文發展史補足缺失的重要面相。甚至，透過報刊的傳播效果，突破原有資訊流通的桎梏，將影響力自上海擴及至江南地區，甚至是全國各地。而此種社會實踐的模式，係源於報刊媒體興起與建立對社會結構造成的改變。

綜上所述，透過編輯群體的諸多抉擇，可發現其它所體現的是當代在西方浪潮衝擊下，並非只有完全被動接受這個單一選項，《瀛寰瑣紀》自《四溟瑣紀》實學內容回歸傳統的轉向，是一種無聲的立場宣告，亦是當代中國社會對於固有文化和文脈的捍衛與傳承，我們可以視之為轉型社會中的另一個面向，並以此觀

點延伸思考，關於新式傳播媒介所開創的諸多機會和可能，進而形構出豐富而多元的晚清社會風貌。

徵引書目

(一) 專著

- 〔明〕徐光啓撰，王重民輯校：《徐光啓集》，臺北：明文書局，1986 年 1 月。
-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卷四，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 年 4 月。
- 〔清〕章鳴鶴撰、〔清〕范棫士點校：《谷水舊聞》，《明清松江稀見文獻叢刊》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2 月。
- 〔清〕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 〔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記》（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7 月。
- 〔清〕姜皋：《浦泖農咨》，上海：上海圖書館，1963 年。
- 〔清〕陳裴之：《澄懷堂文鈔卷》，清道光間刊本。
- 〔清〕汪端：《夢玉生事略》，陳裴之《澄懷堂詩集》卷首，道光三年重刻本。
- 〔清〕沈垚：《落颿樓文集》卷八，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 〔清〕《瀛寰瑣紀》第一卷，上海：申報館，同治十一年十月。
- 〔清〕《四溟瑣紀》第一卷至第十二卷，上海：申報館，光緒元年。
- 〔清〕林樂知主編：《萬國公報》，臺北：華文書局，1968 年。
- 〔清〕趙爾巽：《清史稿·食貨志·賦役》，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 〔清〕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第 8 冊，專輯 34，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 3 月。
- 〔清〕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年。
- 王德威主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臺北：麥田出版，2021 年 1 月。
- 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陳兼、陳之宏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年 1 月。
- 申報館：《1872-1922 最近之五十年：申報館五十周年紀念》，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 年 1 月 1 日。
- 呂文翠：《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一八四九——一九〇八》，臺北：麥田出版，2009 年 11 月。
- 呂文翠：《易代文心：晚清民初的海上文化賡續與新變》，臺北：聯經出版，2016 年 12 月。
- 汪暉、徐國良編：《上海：城市、社會與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 年。
-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新北：稻鄉出版，2013 年 9 月。
- 阿 英：《晚清藝文報述略》，（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1958 年 3 月）。

- 周駿富輯：《清史列傳》（九），〈文苑傳·查揆〉，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 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著，葉光庭等合譯，陳橋驛校：《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12月。
- 洪永鏗、賈文勝、賴燕波：《海寧查氏家族文化研究》，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9月。
-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臺北：麥田出版，2003年。
-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k Anderson）作，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1999年6月。
- 郝平：《丁戊奇荒——光緒初年山西災荒與救濟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5月。
- 郭麗萍：《絕域與絕學：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12月。
- 澳門中國哲學會編：《21世紀中國實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2月。

（二）期刊與專書論文

- 王爾敏：〈晚清實學思所表現的學術轉型之過渡〉，《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6年6月1日第52期，頁19-51。
- 田中初：〈游離中西之間的職業生存——晚清報人蔡爾康述評〉，《新聞與傳播研究》，2004年03期，頁44-50。
- 何宏玲：〈《瀛寰瑣紀》與近代文學風氣的轉變〉，《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2年3月第1期，127-132。
- 李伯重：〈「道光蕭條」與「癸未大水」——經濟衰退、氣候劇變及19世紀的危機在松江〉，《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
- 李鳳、劉文生、熊揚璐、潘孟楠、王發香：〈清代光緒年間的蝗災及治理〉，《百科知識》，2023年5月，頁5-7。
- 周振鶴：〈《瀛寰瑣紀》介紹〉，《書城》，1997年02期，頁38-39。
- 許紀霖：〈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形態、功能與自我理解——以上海為例〉，《史林》，2003年第2期，頁77-89。
- 郭浩帆：〈近代稿酬制度的形成及其意義〉，《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03期，頁83-89。
- 馮建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通變與勵進〉，《歷史研究》2020年第一期。
- 黃長義：〈經世實學與中國學術的近代轉型〉，《江漢論壇》，2005年12期，頁86-

孫邦金：〈全祖望的經史研究及其對乾嘉學風的影響〉，《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0 年 5 月第 23 卷第 3 期，頁 65-70。

戴景賢：〈市鎮文化背景與中國早期近代智識群體——論清乾隆嘉慶時期吳皖之學之興起與影響〉，《文與哲》，2008 年 12 月第十三期，頁 219-270。

（三）學位論文

周 潔：《《四溟瑣紀》研究》，江蘇：蘇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2 年，馬亞中先生指導。

范正琦：《陳文述及其著述研究》，江蘇：揚州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20 年，曹明升先生指導。

陳佩潔：《追憶與重建——論《申報》館第一份文藝期刊《瀛寰瑣紀》的文化復興》，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23 年，呂文翠先生指導。

黃龍彬：《新「聞」時代／海上報刊形塑與文人知識領域之重構（1853-1889）》，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23 年，呂文翠先生指導。